

罗继祖 著

蜉寄留痕

本人未入学校，故无学
玉受学，又家富藏书，浸渍
学成。治学全出家传，以史
代史学文献、典制。落笔为
有韩柳风，记事务真实，尤
锋所触，罔顾忌讳。

总结一生思想所得只七端。
建反殖民，良史直笔略古详今，悲天悯人，同情弱者，针砭世
风，离千余热。

能书画，应人求不索值，自谓为“金不换书”。八十以后
画不复作，惟作书。



历。幼从祖父罗振
涵咏，年二十而
学为主，旁涉历
文，清新简练，
恶稗官燕说。笔

曰：崇儒尊孔，反封

白屋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K825.81
LJZ/1

罗继祖 著

蜉寄留痕



白屋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屋丛书
蜉 寄 留 痕

罗继祖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25 插页 6 字数 215,000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5-2612-7
G·161 定价:14.70元



罗继祖先生伏案读书



作者夫妇在作者八十五寿辰座谈会上

编者的话

在现当代的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另外一个词汇,比“文化”更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注视与思索。世纪初的“五·四”运动,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六七十年代那场浩劫,则唤作“文化大革命”;到了世纪之末的今天,曾经压倒一切的“阶级斗争”等词汇渐已淡出,而“文化”则成为各行各业都想攀附的一种“热点”,似乎不如此,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律。本世纪对“文化”的这种重视,无论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也无论是建设的还是破坏的,都从不同层次反映了中国人这样一种晚来的自觉:文化问题是一切社会变迁的风信仪,而一切社会变迁,最终又必以文化的更新为鹄的。于是文化的主要承载者——文化人,他们的历史命运、行迹心路,也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的问题。

虽然文化人——在古代称作士,历来处于“当路者”与普通民众之间,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历史演进中尤其敏感而又活跃的一群,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与思想发展滞缓,他们的路向与心境倒一直比较的单纯。至少从企望为“王者师”的孟子起,他们骨子里总是以先知先觉自居,而当路者与民众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这一点。于是抱着至少是精神上的优越感,他们可以主要从书本中讨生活,以半是历史,半是心想的尧舜禹汤以来的道统,俯瞰着世俗的生活与王权,等待着当路者延为“帝师”,并

进而圆遂其治国济民的种种蓝图,尽管这蓝图往往被前者视为迂阔,而又为后者所漠视。犹疑与困惑也是有的,但除了忠奸真伪一类非士人独有的普遍性矛盾外,主要只是徘徊于出处之间与终极一致的学派归趋上,至于带有文化更新意义的困扰,即使有,也只是至晚明以后方以萌芽状态出现,且尚不具备动摇根本的性质。于是后来被称作“人文精神”的那种知识者的终极理念,那种不可或违的操守与对理想的九死不悔的追求,因其现实内涵的明晰,得以成功地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相对平和的心境;对于所谓“虚静”的不渝强调,多少有着这种历史情境的反映。

然而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使他们骤然震荡。一切因袭的心理矛盾,由原来偏重于谐和而趋向于尖锐对立。从学与从政,过去由“学而优则仕”相统一,现在因着专业的细化与民族的危亡,变得往往不可得兼;而在这两个层面上,过去虽有新学与旧学,新政与旧政之争,有时也形同水火,但因为归趣其实一致,即有去从,亦不妨大节,有所反复,也无伤根本。然而现在,一切新与旧的较量,却往往有了本质意义的对立。即使有幸而仍专注于学术文化的揣摩研创,但面临中国文化的巨大转型,面临他们曾倚以为生的旧文化传统的基础动摇,书斋生活也再不平静,从新从旧抑或新旧合璧的抉择,已关乎民族文化的何去何从;而一旦自觉地或者被动地卷入社会活动,从新或者从旧,也不再仅是个人进退与对一姓国家的是否忠诚,它已直接关乎亿万兆众之民族的能否生存。而这一切又都使他们必须面临这样的痛苦选择,对那曾视以为生命的一贯的节操、信念等等,究竟是应当顺应还是反叛:是幡然觉醒,成为旧世界的挑战者;还是身心分离,在感受甚至祈向着新生的同时,却无可奈何地随着旧势力的沉沦而沉沦。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抉择痛苦,还不尽于此。由于道统观念的实际破灭,他们失去了用以傲视现实的心想依凭,却也因此有可能更脚踏实地,也更充分地发挥作为当路者与民众之交接点的职能。但是转型时期必有的种种扑朔迷离,使原本幼稚的他们常常感到前路茫茫,欲归何之:新与旧的界限并非泾渭判然,新旧之间的得失是非也非斧斫般分明。作为终极理念的“人文精神”,至此已往往因失却安放的基础而变得难以依凭。即使一旦认清了确实先进的新思想新领袖,而甘当追随左右的“革命军中马前卒”,并为他们所深深宝爱的民众沥血疆场,但由于前者在当时同样的幼稚,他们往往被拒之门外,或者进了门又被扫地出门;又由于民众思想对于精英思想的必然滞后,他们如火如荼的热忱,又常常被视为洪水猛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望天呼吁,在当时已成为这身处于动荡时代而尚欠成熟的一群之普遍心声,在这种真诚悲壮的呼吁中,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竟有了具体而微的缩影;而今天当我们返观他们的行迹心路时,也不必为其每多徬徨,时有摇摆而纳闷,因为除了少数的野心家、权谋家以及徇一己私利的叛徒走狗外,这徬徨、摇摆,正是蝉蜕鱼化时期那苦闷的象征。正是基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上述特殊地位的认识,在当今政治家、实业家的传记热中,我们设计了这一套有关文化人的回忆录丛书。

这是一套并非历史书的历史书,虽然它未有史乘的涵盖性与理论体系,但真诚的追忆所展开的生动细节,必将促使我们去思考史乘所叙述的“然”背后的“所以然”,或者这“然”是否确实“然”,从而引发我们对现有种种史学构架的审视与修正。

这又是一套并非知识读物的知识读物,由不同层次、不同经历的文化人所展开的,远比其先辈广阔的社会生活网络,将使读

者对这个部分身历而即将逝去的世纪,油然而起方方面面的真切回忆,并进而了解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种种后果前因。

自然,它们也并非是小説书,但真诚与素朴永远是美文的底蕴,而文化人特有的敏感与理致,又使这套丛书,在细节的发现与心理的开掘上,更为灵动而精彩纷呈。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在完成了自己当行本色的学术文化之巨大而艰难的转型同时,也参与并深刻影响了本世纪社会形态的同样巨大而艰难的转型,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而贯穿其中的文化人与当路者以及民众的历史性矛盾,又是否能给今天某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所谓“人文精神”应当如何来理解或者更新?在“造福民众”既因基本利益一致而成为真正的共同目标时,当政的文化人与在野的文化人,又如何才能更多一些相互的理解?在迎接新世纪的钟声时,我们每一个人又应当抛弃些什么,坚持并发扬些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在审读着案头那一部部文稿时,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于是,想到了一个似乎尘埋既久的名词——白屋。白屋为贫者所居,又衍而为“白屋之士”,肩负民族振兴伟业的文化人——无论是当政的还是野的,是否应当常记这与民众血肉相联的白屋呢?因取以为丛书名。

赵昌平

1999.8

目 录

庭 闻 忆 略

家世·····	(1)
青少年时代·····	(4)
幼学与交游 教私塾 创办《农报》和东文学社	
办学成绩·····	(24)
从湖北农务学堂到江苏师范学堂 海外视学	
晚清仕途·····	(38)
四十一岁入学部 在学部办了有关学术的几件大事	
愚忠的立场·····	(54)
东渡八年·····	(58)
闭户著书与刊书 永慕园与宸翰楼	
结识升允·····	(71)
开始参加复辟活动 对升允的评价	
入宫觐见溥仪·····	(79)
对逊帝之尊崇 预闻宫禁事与遭谗	
甲子入直与扈驾 朋党	
天津“行在”三年·····	(92)
成了“联日出洋”派的魁首 蒙受冷遇而不灰心	
王静安之死·····	(98)

王入南书房后的通信 从失欢到投湖 辩诬	
迁居旅顺·····	(109)
拥衾话旧 从貽安堂到墨缘堂 和关东军首脑结缘	
六次渡辽与劝驾·····	(118)
劝驾中遭到的谗阻 最后决定	
辞掉参议追随溥仪·····	(122)
伪监察院长的四年·····	(125)
病逝前后·····	(131)
结语·····	(135)
家乘点滴十则·····	(139)
一、我家的籍贯 二、尧钦公的《寄萍盒闻见录》	
三、一生恬退和骨鲠 四、负谤 五、平生师友和	
对待后辈 六、对王观堂的器重 七、蓄长物、不	
殖产 八、辛亥后的思想变化 九、和溥仪的关系	
十、“痼瘕在抱”所做的好事	

涉世琐记

上篇·····	(167)
蓬岛寻梦 歇浦惊潮 集贤息影 嘉乐谈往	
扶桑养晦 梁木兴哀 平安访旧 东华俟清	
下篇·····	(239)
天清地宁 对案五年 三上讲坛 会集群仙	
翠微校史 忧盛危明 重逢解放 “史无前例”	
东山再起 难友奇冤	

附 录

自拟小传·····	(270)
自订年谱·····	(272)

庭闻忆略

家 世

谈家世,先从姓罗谈起。考罗是春秋时江水汉水之间的一个小国,与楚同族,后为楚所灭,后世子孙遂以国名为姓。按我家谱牒,南宋以前无考,南宋时由浙江慈溪迁居上虞北乡(解放后叫小越公社),成为当地老户,世代务农。就我们上世本支来说,也有通籍当官的,顶大做到七品知县。我的太高祖讳敦贤,字希斋,因系庶出,祖遗产业养活不了,遂流寓江淮,后来历充盐司、河督的幕客(俗称绍兴师爷)。晚年告老,得了一笔钱,经营起商业,发了财。我的高祖讳鹤翔,字翼云,以江苏候补布政司理问,历知泰兴、赣榆、高淳、江宁诸县事,终于高邮州知州,当官以干练著称,但年仅四十三就弃世了。我的曾祖讳树勋,字尧钦,承父业定居在淮安城内,田产以外兼营质库——恒益典,因自己不善经营,委托又不得人,不几年就亏负累累,不能家居,幸而捐过候补县丞,不得已避债出走,得署江宁县丞,后来又历署海州州判、徐府经历、清河县丞,卒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月,年六十四岁。

清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时,祖父生于江苏淮

安府山阳县南门更楼东寓庐。母范淑人，山阳副榜举人范咏春以煦长女，生了五子六女。长子振璠字佩南，早故；次子振镛字偶笙，出嗣；祖父次居三，初名振钰，字叔宝，又字式如，后改今名，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

谈到家世使我祖父念念不忘的是两代太夫人。一位是她的祖母方太淑人，方太淑人籍安徽桐城，方是桐城大家，明清两代出了不少名人。太淑人是翼云公的继配，翼云公生二子一女，一女是前室缪太淑人生的，嫁山阳何氏。二子皆太淑人生。长即尧钦公，次仲宣公，名树棠，同治六年举人，终浙江遂昌教谕。太淑人青年孀居。翼云公在兄弟中次居三，希斋公遗产甚丰，诸子多不学好，任意挥霍祖产，反而垂涎三房当官有积蓄，于分家时，兄弟们竟不顾念三房孤寡，把三房摈外不给分。方太淑人慷慨让产，不去争执，并且于清河县立了案，率尧钦公兄弟侨寓淮安，自立门户。祖父小时，太淑人主家政，令一老仆司阍，凡事禀承，一门雍穆，不肃而严，祖父曾描写他小时的生活为“日处春风化雨中”。方太淑人的懿行很多，具见祖父《上虞罗氏枝分谱》（《辽居杂著乙编》）中。

一位是他的母亲范太淑人，太淑人性严毅，有时褊急，因此，人们说祖父有点秉母性，其实祖父秉母性不只这一点。典当亏累后，家境一直处于困难中，日常生活都为难，一遇到儿女婚嫁就更形捉襟露肘。太淑人因为房产是方太淑人辛苦手置的，忍饿也不肯放弃还债，直到祖父三十岁去上海，有了生机，才逐年把宿债还清，过了几年安静的日子。太淑人性慈祥，对来求助的左右邻人虽然自己也在困境，总要设法去帮助。邻人有因穷或别的缘故而吞鸦片自杀的，常常叫祖父用药去解救，因而救活了不少人命，就是在深更半夜也一定叫去。祖父一生以博济为怀，

可以说是禀承母教。如果说祖父还有禀父教的地方,那就是在仕途上不汲汲热衷钻营向上爬,曾祖大半生在外都是署缺,而自甘淡泊,从来没有向上级干求过。

祖父为了报答两位太淑人的劬劳,打算把淮安老宅改为祠堂。建祠的费用即从祖产中自己所得的一份和我父亲罗福成承继长房的一份作价充当,但这个计划被几个身无薄技坐吃山空的庶弟所干扰,未能实现,祖父每引为恨事。

我家迁淮以后的生计,主要靠田产和典当,开典当为期不长,因亏负而闭歇,仅有田产,田产的总额还不够还债的,所以生活困难,百计弥缝,才勉强得过。太高祖以上是农民,太高祖当了一辈子师爷,是吏不是官,高祖做了几任地方官,但曾祖没有能继承下去,仅混上一个佐贰杂职。所以按成份说,只算是个城市小地主。溥仪写《我的前半生》硬派我家是累代书商,祖父是书商世子,不知是哪位好心人捏造出来而被溥仪所深信。从商业性质看,开书店比典当要高尚得多,典当专剥削穷人,而书店虽有剥削,但它能给读书人以精神食粮,中国文化的传播,是从五代和宋以后,刻板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书店作为沟通纽带,是有功的。如南宋临安的书籍铺和福建建阳诸书业,至今挂在人口。是不是溥仪有意高抬我家?显然不是,因为造谣者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溥仪竟全是受蒙蔽。

青少年时代

幼学与交游

祖父四岁识字，五岁入塾读书，聪颖过人。塾师是山阳一位老拔贡，本是尧钦公的业师。由于祖父体弱多病，家里督课不太严，而读书善悟，每为塾师所惊异，方太淑人在诸孙中也特别器重祖父。十五岁读完经书，开始下笔学作诗文，因为兴趣广泛，又想学刻印，拿一百个制钱从卖旧货人手里买了一颗汉人私印，佩在身上，作为师法，从此产生了好古之癖，可见祖父一生好古，幼年就已植下根基来了。十六岁开始学作八股文。这年的春天，尧钦公送长次二子回乡应试，祖父八股文刚好能做半篇，估计不会取中，也叫随去观场，没想到竟以第七名入了县学。这一次出门，不仅考中秀才为可喜，而且大开了眼界。在杭州郡庠看到宋高宗写的《孝经》石刻和仪征阮氏摹勒的《石鼓文》，还亲手拓了一份《石鼓文》带回家。游西湖，看到山上的唐宋人题名，摩挲流连，不忍离去，想买一份拓本，但买不到。于前辈学者中，在郡城醉经堂书店不期而遇到乌程汪谢城（曰楨）。汪高龄已七十，时正做会稽教官，是一位饱学而知名的老先生，谈了几句话就很契合，老先生把他辑刻的一部《荔墙丛刻》赠给了祖父。这一年老先生就死在任上。另一位是桐城吴康甫（廷康），以藏古砖著名，年纪比汪还大，送了祖父古琴拓本四幅，求他的著作，说还没有整理成书。

回家后,尧钦公受不了债家的追讨,急于要出门避债,正好得到补缺的好消息,就去应官上任。家里的事交给范太淑人掌管。考虑到长子佩南公为人太老实,怕应付不了,就叫祖父助理。祖父当时才十六岁,平日不出书房门,不得已勉强接受。祖父在《集蓼编》里说:“府君将债单并令司田租者山阳程西屏一一与予接洽。予阅单,不胜惶骇,汗出如浆,初见司田租者,如接大宾,几不能措一辞,久乃相习。”(《贞松老人遗集》甲集之一,1941年版)。这时祖父一日之中,既忙应付债主,又为家中生活而奔走,晚饭后才得读书,每晚都要耗费两盏灯油,等油已烧尽,则已听到鸡叫天亮了。然后才能睡一小时。这样过了一年,以致患了严重的失眠症,身体日益羸瘦。没有钱就医,听之自然,后来慢慢才好了。不过失眠症到老年后还时时要犯。

当时兄弟间思想有点分歧,佩南公认为要振兴门户非从致力科举下手不可,所以在这方面很下功夫,而祖父似乎对科举不抱多大幻想,认为科举中不中完全操在人家手里,惟有潜心学问才是操之于己手,人家抢不去。但是尧钦公相信算命瞎子的话,说祖父命里应得科第。祖父为了安慰亲心,不得不曲从,从山阳杜宾谷(秉寅)学做八股文。结果,佩南公光绪壬午(1882年)乙酉(1885年)两次下场都没有中。丙戌(1886年)八月,染时疫病歿。祖父也是壬午和戊子(1888年)两次下场不中,从此就绝迹棘闱,不再存侥幸之想而专一搞学问了。祖父入学第二年到江宁省视尧钦公,得到一部《皇清经解》,如获异宝。拿回去之后,计划每天读三册,在一年内把全书研读了三遍,于是学业大进,深通清人经史考据之学,同时对传世的金石文字也特别注意,作为重要的研究资料来看待。自己曾说:“予今日得稍知读书门径,盖植基于是时。”实际祖父一生治学的坚实基础,这时已经建立起来了。不信,可以拿祖父十九岁时著的一部《读碑小笺》作



罗振玉自治印

证。《读碑小笺》著于光绪甲申(十年,1884年),我手内存的刻本,扉页题“光绪十四年孟春刊”,是先祖母范太淑人拿自己戴的簪珥换钱刻成的,薄薄二十一页的书,共收笔记九十九条(小序作“百则”,举成数),主要内容是以金石证经史,开头两条就是用碑刻订正段注《说文》的。书里订正《金石萃编》的竟达十九条之多,其他则《集古录》两条,《金石录》三条,《中州金石记》两条,《字汇》、《正字通》、《宝刻类编》、《授堂金石跋》、《关中金石记》、《曲阜志》、《清河书画舫》、《书画跋跋》、《虚舟题跋》、《史通》、《晁氏读书志》、《避暑录话》、《蚁术编》、《滇黔纪游》各一条。如果不是遍读群书又能融会贯通,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而且文字简练,论断精严,看来根本不像出于年才弱冠人的手笔。无怪十三年丁亥(1887年)又刻了一部《存拙斋札疏》,竟被德清俞曲园(樾)误认为本朝名宿,摘引了好几条于他所著的《茶香室笔记》中,曲园先生是当代经师,地位和誉望又在汪谢城先生之上,不知祖父那时仅是刚入学不久的一个青年学者。后来有人把这本书送给江宁汪梅村(士铎)看,梅村先生也是誉满大江南北的著名学者,

时年八十余，眼睛几乎失明，口授人写了一篇跋，评价是“考证极多精覈”，“年裁逾冠，斐然有成，后来之彦，非君莫属。”祖父平生，很不愿意受人表褻，这篇跋是别人代求的。

祖父一生治学至老不倦，而发端却都在幼年时，辙迹历历可寻。我写《永丰乡人行年录》时，认为十五岁买汉印为有印癖之始；十六岁摩挲西湖诸山铭刻不肯去，为癖金石铭刻之始；十八岁买淮安钦工镇出土的古镜为搜集文物之始；二十岁著《读碑小

序三四師工書入外王十國令中上
朝上朝真還期聚夫眾戰戶政分兩
對輕王休用止前賢齊中甘筆齊亦
附用 此身如昔人神九等以此而推之
先之召博愛陳之召建義宋之召好應不肅而厥不
嚴不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者都無不出府門政
約令行強不暴憲知不詭惡屬駐移教無對會之事
散外來庭 第江王食項 康平間自自相罪者上
歷事三聖而厥德維慈易相二十而受遇蓋深蓋剋
復上都者再戰定東京者一其餘鹿城衛邑得傳推
鋒亦非遠數之所同也信可謂王國城虎生人廢麻
者歟 節臨郭敬之家廟碑銘 自松羅振玉
三十六年甲子著附北魏後日印吹第奇人早
以名人治兵禽小為少禽指身星時空惟伯
名物主為及可香溪江陽是一修身理大色
為於陳 書通為先生上信一書生而教之

罗振玉四体书屏